



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的兴衰

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下文简称“春合”），是一家由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体育器械生产企业，后来成为天津“中华老字号”企业之一。

春合建厂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但都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初。地址是天津南开中学对面两间租赁的厂房。春合的出现，是偶然和必然的碰撞。偶然，是源于一位皮革行业创业者的失败；必然，是那个时代对体育用品的需求。春合的创始人之一傅泊泉，曾经在天津华北制革厂当学徒。之后，他曾与人联手创办“三合成”皮件作坊，惜乎失败。而后，他找到兄长傅泊川商议创业。他们联合本家傅清淮、傅清波、傅万安、傅万金四人联合办厂。傅泊川、傅泊泉、傅清淮和傅清波各出资100银元，傅万安和傅万金各出资200银元，共800银元，取六人“六合同春”之意，为工厂命名，创办了春合制革厂（别称“春合工厂”），也就是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的前身。几年后，春合制革厂改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原址改为营业部，另在马场道建立工厂。

傅泊川出任春合总经理。他不仅擅中医，还是天津西沽学校的一位教师。他的学识和人脉使其对体育的认

识更加深刻，并能够获得志同道合者的有效支持。地利加上人和，春合得以在南开中学的支持中走过初创岁月。

那个时候，体育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如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认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曾在南开学校成立40周年时总结道：“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体育受重视，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和对国货的期待召唤着本国体育用品的生产。南开学校（后改名南开中学）曾与春合结缘，在后者建厂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厂之初，春合并没有制球技术，而是对进口球进行模仿。因为质量差，虽然价格低，也无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春合与南开中学合作，向师生提供球试用，并收集使用意见。通过产品与用户的不断磨合，春合终于摸索出了自己的制作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并逐渐打开销路。春合此时的产品，主要是手工缝制的篮球、排球、足球等，以“醒狮”为商标。但产品的稳定性受制于皮革质量。春合决定改变皮革依靠购买的状态，开办制革厂。

制革厂开办的时间，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春合购入20多间平房，开办制革厂（春华制革厂），开工时，请了几位华北制革厂的技术工人，后又聘请制革专业的毕业生石炳星为技师，还聘请了燕山大学制革专业主任张克刚为顾问。不仅如此，春合还与燕京大学和天津工学院的制革系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在

不间断的技术支持下，春合专用的皮革质量持续提升。对于产品质量，有各类、各地使用者的反馈可供佐证，其中有这样一封写在1933年7月青岛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用笺上的奖誉书：“本届华北运动会，购用贵厂各种运动器械，物质坚实，制造合法。各运动专家无不交口称赞。来日，竞争国际销场，抵制舶来……此致，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

春合在上世纪30年代前中期快速发展壮大。从建厂到七七事变之前，春合的资金从建厂之初的800元到了八九万元，员工从几人发展到两三百人。除了生产球类、球拍、靴鞋、服装、刀枪剑戟、体操器械等多种体育用品和比赛用具，春合还能够设计和承造与体育相关的建筑工程。据《勤奋体育月报》1935年第8期《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产销概述》：“该厂起初出品不过数十种，现在谁不知道能自制出品数千种呢！人称为体育界之武库，谁曰不然！”春合的产品不仅在国内上海、沈阳、长春、汉口、成都、太原等城市发售，还远销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和欧美多国。

在员工待遇上，春合超越同时代的许多企业。据1934年第2期《勤奋体育月报》上《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厂部及劳工概况》一文，春合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最低的工资为十二三元；为员工提供餐食和医疗服务，并为有家眷的员工提供房子和补助；为员工开设运动场，“早晨为郊外

游行时间，下午停工后，群趋运动场”，进行各种体育练习或比赛。此外，春合“有教育班，教授工友国文算数，日用常识”，还开设工人工子弟学校，对职工子弟开放。春合在产品和管理上的良好把控，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春合一片大好的发展前景被社会动荡打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天津。春合安排员工回原籍避难，局势稍微稳定后，勉强开工。这一时期，春合的生产规模缩小至之前的三分之一，且持续恶化。1939年8月，天津水灾，工厂被淹，春合再次停工。因为工厂和营业部分别在华界和租界，迫于日军对各国租界的封锁，春合被迫营业停顿。后另设售货点，勉强维持，更一度靠给大中华橡胶厂和正泰橡胶厂代销运动鞋，获得一些收入。

而这种惨淡的日子也并未长久。1941年，日军开始对牛皮进行管制，春合下属制革厂的原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通过私运和远地采购进行自救，但风险太大且杯水车薪。1945年日本投降。春合本以为出现了重大转机，但实际上只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随即，内战开始，生产、营商环境依然恶劣。春合仍处于艰难经营的状态中。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的磨合和政府扶持，春合焕发了勃勃生机，生产规模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为我国体育事业的腾飞作出突出贡献，特别是“中华牌”体育器械享誉海内外。

魏淑赞

成语小故事——

寸木岑楼

“寸木岑楼”成语由“方寸之木可高于岑楼”变化来，出自《孟子·告子下》。有一位任国的人向孟子的学生屋庐子问礼与食哪个重要的问题，屋庐子随口答道“礼重要”。任人又问道：“娶妻与礼哪个重要？”屋庐子答道：“还是礼重要。”

随后，这位任人便一本正经地说道：“要是按着那些礼节去找吃的，恐怕就要挨饿、甚至饿死；如果不按着那些礼节去找吃的，可能就会有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还要按着礼节去行事吗？再有，假如按照亲迎礼，就得不到妻子；要是不行亲迎礼，就能得到妻子，还一定要行亲迎礼吗？”

这一问，屋庐子没有答出来。第二天，便去邹国，转告了老师孟子。

孟子听后，说道：“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的？如果不揣度基地的高低是否一致，那么一寸长的小木头也可能比顶端的高楼还要高。说金子比羽毛重，但是，岂能说三钱多重的金子也比一车的羽毛还要重？拿吃的重要与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与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回答他：‘扭折了自己哥哥的胳膊而夺取了他的食品，自己便有了吃的；而不扭折，便得不到吃的，那么他会去扭折吗？越过东邻的墙去搂抱人家的女子，便得到了妻子；而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么他会去搂抱吗？’

后人用“寸木岑楼”成语来比喻差距悬殊。

火树银花



睿宗是唐代君主中最会享乐的一位皇帝，虽然他只当了三年的皇帝，但不管什么佳节，他总要用很多的物力人力去铺张一番，供他游玩。他每年逢正月元宵的夜晚，一定扎起二十丈高的灯树，点起五万多盏灯，号为火树。后来诗人苏味道就拿这个做题目，写了一首诗，描绘它的情形。

他的元夕诗写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四季，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首诗把当时热闹的情况，毫无隐瞒地描写出来，好象活跃在我们读者的眼前。

这句成语是形容灯火盛的地方，看上去好像是火树银花的样子。所以现在凡是繁盛的都市，或有盛大的集会在夜间举行，灯光灿烂，都可以用这句话去形容它。

天津地名考——

“树”名村巷

天津以树林、树木为名的村巷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河北区南部的“小树林”。清末，此地有一片繁茂的树林，后建成居民区，人称“小树林”。小树林大街、小树林胡同皆由其派生。另如西青道附近的张家树林大街、北运河东岸的孟家树林大街、早桥附近的北竹林大街、大沽南路的柳林路、挂甲寺附近的丛林胡同、贵阳路的植林里等。

以“大树”为名的地名，有大树胡同、大树李胡同、北大树胡同、大树赵家胡同、贾家大树胡同等。另有村落名十棵树、双杨树、双树乡、四棵树一等，里巷名有四棵树胡同等，都是以大树作为标志物来命名聚落的。

以具体树种为名的村巷，“松”、“柳”、“桃”数量较多。“松”居首位，例如松树里、松树胡同、松树庄等。以“松”字打头的地名还有松江路、松乐里、松茂里、松月村、松柏巷、松杉路、松盛里、松筠里、松风里、松林里、松善里、松寿里、松涛里、松阳里、松竹里、松楠楼、松青胡同、松盛胡同等。

津门旧事——

天津第一家电影院

电影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时不叫电影，而称电光影戏。1905年6月16日，天津的《大公报》首次使用“电影”一词。《大公报》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报纸之一，由于它的影响，“电影”一词很快在京、津地区乃至全国流行开来。

1906年12月8日，美国平安电影商人来到天津，租用法租界内的权仙茶园（今滨江道吉林路交口）放映电影，每三天更换一批新影片。由于连续放映数月，这段时间，电影即成了该茶园的主要业务，所以，不久它就更名为“权仙电戏园”，从此，天津有了第一家电影院。该园最早由法商百代公司电影机械部负责人周紫云经营。最初，权仙电戏园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全由百代公司供给，后来由于生意兴隆，影院又添置了放映机、小型发电机。影院上映的都是国外最新潮的影片，如美国侦探片《红眼盗》《巴林女》，战争片《美墨大血战》，科幻片《木头人》，更有卓别林的滑稽剧和世界风景片等等，总计有五六百卷。一些影片在国外刚刚上映不久，就会在权仙电戏园上演。数月后，权仙电戏园名声大噪，享有“甲于京津”之称。观众们争先恐后地购票观影，一周后的电影票有时都被订购一空。为方便夜场观众观影，该园特向电车公司订下两辆电车，专供送晚场观众回家。此后，周紫云又成立了权仙电影公司，专门为各大富绅公馆喜寿庆会和军营士兵娱乐活动服务。当年天津就有“看电影到平安，电影公司数权仙”的说法。

1908年，权仙电戏园受灾，致使天津“半年多没有电影”。由于观众的需要，翌年影院又在原址上重建，



更名为“新权仙”。1912年，因租界地租金太高，周紫云遂在南市东兴大街租借东兴公司地盖起了当年所谓华界最豪华的仿古式电影院。舞台设施与戏院相同：上下场门，戏桌、戏椅，下场门设场面席。因为当年人们习惯称租界地为“下边”，“华界”为“上边”，故而影院改名为“上权仙影院”，同时在其北侧又联建了西餐厅，名“洋饭店”。

1916年，因洋饭店不慎着火，上权仙影院也在火灾中化为灰烬。幸亏事发前影院曾在英商保险公司投了保，尽管费了不少周折，最后还是经法院判决，影院得到了50%的赔款。1918年，周紫云用保险赔款加上多年的积蓄，选新址荣业大街重又建起了影院，仍称上权仙影院。开业后，新影院上座率很高。电影公司承接的外出放映业务也日渐红火。1952年，上权仙影院收归国有。

故宫珍宝——

镂雕龙凤纹银铺首

西汉镂雕龙凤纹银铺首宽14.9厘米，环长12.9厘米。作兽面衔环式，背部有插钉，兽面较小，额上双角细长，向两侧环绕，又反穿角根之上，高耸为一云头形饰，两条细长的盘龙攀登在环绕的兽角上，昂首向外探视，龙首及兽角均起脊，清新明快，柔中带刚，兽面舌部衔一饰有双龙双凤环，造型优美，装饰华丽。



嵌金片花纹铁匕首



西汉嵌金片花纹铁匕首通长36.7厘米，身宽4.3厘米。匕首与茎铁质，环首与格用银基合金铸造并焊接，身扁平，平脊隆起，茎宽扁，两侧边缘鼓圆而中空，环首镂空。装饰华丽。身部脊两侧嵌金片作对称纹饰，一面为火焰纹，一面似云纹，环首嵌金片作卷云纹，近茎部及格部作兽面纹，金银铁三色交相辉映。

铜说唱俑



西汉铜说唱俑高7.8厘米，跪坐形，头戴鎏金圆帽，高髻，身穿右衽长袖衫，袒胸露腹，腰束带，右手上举至耳，左手置于腿上，高颧骨，蒜台鼻，尖下巴，表情滑稽，为倡优人形象，造型生动，制作精细，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是研究汉代俳优表演艺术的珍贵的实物标本。

鼎形铜熏炉



西汉鼎形铜熏炉口径26厘米，承盘径30厘米，通高28.5厘米。鼎身敞口，微鼓腹，大平底，三高足，足作立兽踩朱雀状。腹部有对称的四环钮，钮下饰宽带凸弦纹一周。平底中心镂一小圆孔，四周有12个长方孔，作四边对称排列，孔长3.5-5、宽0.6-0.8厘米。盖面鼓，正中有一环钮，盖面镂圆形孔12个，作两圈排列，内圈四个，外圈八个，孔径2.3厘米。炉下有承盘，圆形，直壁，平折沿，大平底。盘壁一侧开一流状缺口，宽6.3厘米。焚香时，缕缕香烟袅袅上升，灰烬从炉底落入承盘内，从缺口处加以清除，造型极其精巧。

鎏金花鸟纹八棱提梁铜熏炉

辽代鎏金花鸟纹八棱提梁铜熏炉高14厘米，腹径11.6厘米，通体鎏金。炉身八棱，敛口，折肩，平底。肩两侧各有一环，与弧形提梁相连接。梁顶中部有一长链，与盖面的环钮相连。盖呈八角僧帽状，上有镂孔，沿四周模压云形灵芝纹。肩及近底部各饰花卉纹一周。腹部镌刻精细的花鸟纹。

